

東方文化集成

季羨林 創始主編

東南亞文化編

中國古籍中有關 泰國資料匯編

黃重言 余定邦 編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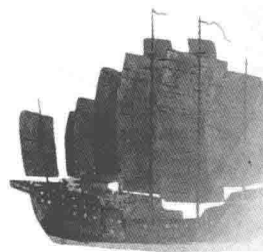
東方文化集成

季羨林 创始主编

东南亚文化编

中国古籍中有关 泰国资料汇编

黄重言 余定邦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籍中有关泰国资料汇编/黄重言,余定邦编著,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

(东方文化集成)

ISBN 978-7-301-26045-6

I. ① 中… II. ① 黄… ② 余… III. ① 泰国—古代史—史料 IV. ① K3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8865号

- | | |
|-------|--|
| 书 名 | 中国古籍中有关泰国资料汇编
ZHONGGUO GUJI ZHONG YOUGUAN TAIGUO ZILIAO HUIBIAN |
| 著作责任者 | 黄重言 余定邦 编著 |
| 责任编辑 | 刘 虹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6045-6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kupress_yan@qq.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
| 印 刷 者 | 北京大学印刷厂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30.75印张 650千字 |
| |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92.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东方文化集成”编辑委员会

创始主编 季羨林

名誉总顾问 林祥雄 炎黄国际文化协会会长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研究教授

名誉顾问

杜德桥 英国大学汉语研究所所长、教授
冉云华 加拿大麦克斯特大学教授
饶宗颐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谭中 印度尼赫鲁大学院汉语系主任、教授
池田大作 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 北京大学名誉教授
王庚武 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前香港大学校长
马悦然 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教授 诺贝尔奖瑞典文化学院评审委员会委员
杜维明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哈佛燕京学社前主任 北京大学研究教授
安乐哲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
罗亚娜 斯洛文尼亚卢布亚纳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欧洲中国哲学研究会会长

特别顾问 陈嘉厚 张殿英

顾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镛 叶奕良 卢蔚秋 刘 烜 孙承熙 仲跻昆 李中华
李 谋 吴同瑞 张广达 张岂之 张光璘 姚秉彦 赵常庆
梁立基 袁行霈 麻子英 黄宝生 楼宇烈

主 编 张玉安 唐孟生 严绍盪 王邦维

“东方文化集成”分编主编

东方文化综合研究编

孟昭毅 郁龙余 侯传文

中华文化编

张 帆

日本文化编

严绍盪 王新生

朝鲜、韩国、蒙国文化编

李先汉 金景一 陈岗龙

东南亚文化编

裴晓睿 罗 杰

南亚文化编

薛克翘 魏丽明

伊朗、阿富汗文化编

王一丹 张 敏

西亚北非文化编

赵国忠 吴冰冰 林丰民

中亚文化编

吴宏伟

古代东方文化编

拱玉书 李 政

编辑部成员

主 任 唐孟生

副主任 李 政 林丰民 魏丽明

秘 书 樊津芳

“东方文化集成”总序

季羡林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所谓“世纪”和“世纪末”，本来是人为地创造出来的。非若大自然中的春、夏、秋、冬，秩序井然，不可更易，而且每岁皆然，决不失信。“世纪”则不同，没有耶稣，何来“世纪”？没有“世纪”，何来“世纪末”？道理极明白易懂。然而一旦创造了出来，它就产生了影响，就有了威力。上一个“世纪末”，19世纪的“世纪末”，在西方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中就出现过许多怪异现象，甚至有了“世纪末病”这样的名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待辩论与争论。

当前这一个“世纪末”怎样呢？

我看也不例外。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政治方面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不平静。文化或文明的辩论或争论就很突出。平常时候，人们非不关心文化问题，只是时机似乎没到，争论不算激烈。而今一到世纪之末，人们非常敏感起来，似乎是憬然醒悟，于是东西各国的文人学士讨论文化的兴趣突然浓烈起来，写的文章和开的会议突然多了起来。许多不同的意见，如悬河泄水，滔滔不绝，五光十色，纷然杂陈。这样就形成了所谓“文化热”。

在这一股难以抗御的“文化热”中，我以孤陋寡闻的“野狐”之身，虽无意随喜，却实已被卷入其中。我是一个有话不说辄如骨鲠在喉的人，在许多会议上，在许多文章中，大放厥词，多次谈到我对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以及东方文化在未来的新世纪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地位等等的看法。颇引起了一些不同的反响。

为说明问题计，现无妨把我个人对文化和与文化有关的一些问题的看法简要加以阐述。我认为，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久暂，几乎都在广义的文化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大小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深浅不同，长短不同：

但其为贡献则一也。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的民族或国家共同建造成的。使用一个文绉绉的术语,就是“文化多元主义”。主张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是法西斯分子的话,为我们所不能取。

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文化决不独占山头,进行割据,从而称王称霸,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世袭珍藏,把自己孤立起来。文化是“天下为公”的。不管肤色,不择远近,传播扩散。人类到了今天,之所以能随时进步,对大自然,对社会,对自己内心认识得越来越深入细致,为自己谋的福利越来越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交流。

文化虽然千差万殊,各有各的特点;但却又能形成体系。特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组成了一个体系。据我个人的分法,纷纭复杂的文化,根据其共同之点,共可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再扩而大之,全人类文化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人类并没有创造出第三个大文化体系。

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有其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既然同为文化,当然有其共同点,兹不具论。其不同之处则亦颇显著。其最基本的差异的根源,我认为就在于思维方式之不同。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倘若仔细推究,这种差异在在有所表现,不论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还是在理工学科中。我这个观点曾招致不少的争论。赞成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想同我商榷者有之,持保留意见者亦有之。我总觉得,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东西方文化了解研究得都还不够深透,有的人连我的想法了解得也还不够全面,不够实事求是,却唯争论是尚,所以我一概置之不答。

有人也许认为,我和我们这种对文化和东西文化差异的看法,是当代或近代的产物。我自己过去就有过这种看法。实则不然。法国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所著《丝绸之路》这一部巨著中有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论述,大多数为我们所不知。我在这里不详细介绍。我只引几段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论述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的话:

由扎希兹转载的一种萨珊王朝(226—Ca.640年)的说法是:“希腊人除了理论之外从未创造过任何东西。他们未传授过任何艺术。中国人则相反。他们确实传授了所有的工艺,但他们确实没有任何科学理论。”(329页)

姜林按：最后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中国也是有理论的。这就等于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完全是隔膜的外行话。书中还说：

在萨珊王朝之后，费尔多西、赛利比和比鲁尼等人都把丝绸织物、钢、砂浆、泥浆的发现一股脑儿地归于耶摩和耶摩赛德。但我们对于丝绸织物和钢刀的中国起源论坚信不疑。对于诸如泥浆——水泥等其余问题，它们有99%的可能性也是起源于中国。我们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安息——萨珊——阿拉伯——土库曼语中一句话的重大意义：“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约萨法·巴尔巴罗于1471年和1474年在波斯就曾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他同时还听说过这样一句学问深奥的表达形式：“希腊人仅懂得理论，唯有中国人才拥有技术。”（376页）

关于一只眼睛和两只眼睛的说法，我还要补充一点：其他人同样也介绍了另外一种说法，它无疑是起源于摩尼教：

“除了以他们的两只眼睛观察一切的中国人和仅以一只眼睛观察的希腊人之外，其他的所有民族都是瞎子。”（329页）

我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引这许多话，绝不是因为外国人夸中国人有两只眼睛而沾沾自喜，睥睨一切。令我感兴趣的是，在这样漫长的时间以前，在波斯和阿拉伯地区就有了这样的说法。我们今天不能不佩服他们观察的细致与深刻，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除了说中国没有理论我不能同意之外，别的意见我是完全同意的。在当时的世界上，确实只是中国和希腊有显著、突出、辉煌的文化。现在中国那一小撮言必称希腊的学者们或什么“者们”，可以憬然醒悟了。

但是这也还不是令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我最浓烈的兴奋点在于，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畅谈东西文化之分，极富于近现代的摩登色彩。波斯和阿拉伯传说都证明：东西文化之分的说法，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而已。其次，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文化的东西二分法，我并非始作俑者，古代的“老外”已先我言之矣。令我更感到欣慰的是我讲的东西方思维方式是东西文化的基础。波斯和阿拉伯古代的说法，我认为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分析出理论，综合出技术，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时至今日，古希腊连那一只眼睛也早已闭上，欧洲国家继承并发扬了古希腊辉煌的文化，使欧洲文化光照寰宇。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也跟了上来，普天之下，莫非欧风。欧美人昏昏然陶醉于自己的胜利之中，以“天之骄子”自命，好像有了两三只眼睛。但他们完全忘记了历史，忽视了当前的危机。而中国呢，则在长时期内，由于内因和外因的缘故，

似乎把两只眼睛都已闭上。古代灿烂文化不绝如缕。初则骄横自大,如清初诸帝那样,继则震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同样昏昏然拜倒在西方的什么裙下,一直到了今天,微有苏醒之意,正在奋发图强中。

从上面谈到的历史事实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东西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本来是两句老生常谈,是老百姓的话,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我提出来说明东西文化的关系,国内外都有赞成者,国内外也有反对者,甚至激烈反对者。我窃以为这两句话只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古代哲学讲变易,佛家讲无常,连辩证法也讲事物时时都在变化中。大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内心,无不证明这两句话的正确。我不过捡来利用而已。《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的不也就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吗?

可是东西方都有人昧于这个浅显的道理。特别是在西方,颇有人有意识或无意识中,觉得自己的辉煌文化会万岁千秋地辉煌下去的。中国追随者也大有人在。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文化也像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不会永驻的,也是有一个诞生、发展、成长、衰竭、消逝的过程的。

但是,中国有一句俗话:是非自在人心。人是能够辨是非,明事理的。以自己的文化自傲的西方人也不例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这种人简直如凤毛麟角。一战爆发,惊醒了某一些有识之士。事实上在一战爆发前,就有人有了预感。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爾(Oswald Spengler)在1911年就预感到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后来大战果然爆发。从1917年起,斯宾格爾就开始写《西方的没落》。书一出版,立即洛阳纸贵。他的基本想法是:文化都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青春,二、生长,三、成熟,四、衰败。尽管他的推论方法,收集资料,还难免有主观唯心的色彩。但是,他毕竟有这一份勇气,有这一份睿智,敢预言当时如日中天的,他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八个文化中唯一还有活力的文化也会“没落”。我们不能不对他表示敬意。美中不足的是,他还没有认识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存在和交流关系。(参阅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

在西方,继斯宾格爾而起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他自称是受到了前者的影响。二人同样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是他们有先见卓识之处。汤因比继承了斯宾格爾的意见,认为文化——他称之为“文明”——都有生长一直到灭亡的过程。他把

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分为21种,有时又分为26种。这些意见都表述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1934—1961年),共12卷。他比斯宾格尔高明之处,是引入东方文化的讨论。到了70年代,他同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对话时,更进一步加以发挥,寄希望于东方文化。(参阅《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我并不认为,斯宾格尔和汤因比——继他们之后欧美一些国家还有一批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赞成他们的意见,我在这里不具引——等的看法都百分之百正确。但在举世昏昏,特别是欧美人昏昏的情况下,唯独他们闪耀出一点灵光,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们的看法从大体上来看,我认为是正确的。如果借用上面提到的古代波斯和阿拉伯人的说法,我就想说:希腊人及其后代的那一只眼睛,后来逐渐变成了两只眼睛;可物极必反,现在快要闭上了。中国人的两只眼睛,闭上了一阵,现在又要睁开了。

闭上眼睛的欧美人士,绝大多数一点也不了解东方,而且压根儿也没有了解的愿望。我最近多次听人说到,西方至今还有人认为中国人还缠小脚,拖辫子,抽大烟,养小老婆。甚至连文人学士还有不知道鲁迅为何许人者。在这样地球越变越小,信息爆炸的时代,西方之“文明人”竟还如此昏聩,真不能不令人大为惊异。反观我们中国,情况恰恰相反。欧美的一切,我们几乎都加以崇拜。汉堡包、肯德基、比萨饼,甚至莫须有的加州牛肉面,只要加一个洋字,立即产生大魅力,群众趋之若鹜。连起名字,有的都带有点洋味。个人名字与店铺名字,莫不皆然。至于化妆品,外国进口的本来就多。中国自造的也多冠以洋名,以广招徕。爱国之士,无不痛心疾首,谴责这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和行为。然而,从一分为二的观点上来看,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专就东西而论,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对西方几乎是了若指掌,而西方对东方则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是一团漆黑。将来一旦有事,哪一方面占有利条件和地位,昭如日月矣。

对西方的文化,鲁迅先生曾主张“拿来主义”。这个主义至今也没有过时。过去我们拿来,今天我们仍然拿来,只要拿得不过头,不把西方文化的糟粕和垃圾一并拿来,就是好事,就会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有利。但是,根据我上面讲的情况,我觉得,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为了全体人类的福利,为了全体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义务要送去的,但我们决不会把糟粕和垃圾送给西方。不管他们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们总是要送的。《诗经·大雅》

说：“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西方文化给人类带来了一些好处。我们中国人，我们东方人，是懂得感恩图报的民族。我们决不会白吃白拿。

那么，报些什么东西呢？送去些什么东西呢？送去的一定是我们东方文化中的精华。送去要有针对性，针对的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个西方文化产生的“危机”。光说“危机”，过于抽象。具体地说，应该说是“弊端”。近几百年以来，西方文化产生的弊端颇多，举其大者，如环境污染、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生态平衡破坏、物种灭绝、人口爆炸、新疾病丛生、淡水资源匮乏等等。此等弊端，如不纠正，则人类前途岌岌可危。弊端产生的根源，与西方文化的分析的思维方式有紧密联系。西方对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大自然分析不息，穷追不息，提出了“征服自然”的口号。“天何言哉！”然而“天”——大自然却是能惩罚的，惩罚的结果就产生了上述诸种弊端。

拯救之方，我认为是有的，这就是“改弦更张”“改恶向善”，而这一点只有东方文化能做到。东方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综合，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天人合一”，张载的《西铭》是一篇表现“天人合一”思想最精辟的文章：“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下略）印度哲学中的“梵我一如”，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总之，东方文化主张人与大自然是朋友，不是敌人，不能讲什么“征服”。只有在了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的条件下，才能伸手向大自然索取人类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也只有这样，人类的前途才有保障。

我们要送给西方的就是这种我们文化中的精华。这就是我们“送去主义”的重要内容。

我们的“李”送了出去，接受不接受呢？实际上，我们还没有正式地送，大规模地送。连我们东方人自己，其中当然包括中国人，还不知道，还不承认自己的这种宝贝，我们盲目追随西方，也同样向自然界开过战，我们也同样有那一些弊端，立即要求西方接受，不也太过分了吗？不过，倘若稍稍留意，人们就会发现，现在世界各国，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也不管是根据什么哲学，注意到上述弊端而又力求改变的人越来越多了。今年《日本经济新闻》刊载了高木韧生的文章，说21世纪科研重点将是“人类生存战略”。这的确是见道之言。我体会，这里所说的“科研”包括文理两个方面。作者把科研提高到“人类生存”这个高度来看，不能不谓之有先见之明，应该受到我们大家的最高的赞扬。至于惊呼人口爆炸的文章，慨叹新疾病产生的议论，让人警惕环境污染、臭氧层

破坏、生态平衡的破坏、淡水资源的匮乏等等的号召，几乎天天可见。人类变得聪明起来了，人类前途不是漆黑一片了。我想，世界各国每一个有心人，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我这一个望九之年的耄耋老人，也为之手舞足蹈了。

我在上面刺刺不休说了那么多话，画龙点睛，不出一字：我曾有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说过一篇短话，题目叫做“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我在上面说的千言万语，其核心就是这一句短短的话。至于已经来到我们门前的21世纪究竟是什么样子？西方文化究竟如何演变？东方文化究竟能起什么具体的不是空洞的作用？人类的前途究竟何去何从？所有这一切问题，都有待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加以证明。从前我读过一个近视眼猜匾的笑话。现在新的一个世纪还没有来临，匾还没有挂出来，上面有什么字，我们还不能知道。不管自诩眼睛多么好，看得多么远，在这一块尚未挂出来的匾前，我们都是近视眼。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就是了解。我们责怪西方不了解东方文化，不了解东方，不了解中国，难道我们自己就了解吗？如果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就应该坦率地承认，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并不全了解中国，并不全了解东方，并不全了解东方文化。实在说，这是一出无声的悲剧。

了解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而学习首先必须有资料。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学习资料首先是文字，也就是书籍。环顾当今世界，在“欧洲中心论”还有市场的情况下，在西方某一些人还昏昏然没有睁开眼睛的时候，有关东方的书籍，极少极少。有之，亦多有偏见，不能客观。西方如此，东方也不例外。即使我们有学习的愿望，也是欲学无书。当然，东方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各国刊出书籍的多寡也不尽相同。但总之是很少的。有的小一点的国家，简直形同空白。有个别东方国家几乎毫无人知，它们的存在在一团迷雾中，若明若暗，似有似无。这也是一出无声的悲剧。

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这一批人不自量力——或者更明确地说是认真“量”过了自己的“力”，倡议编纂这一套巨大空前的“东方文化集成”。虽然，我们目前的队伍，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还不是太大；我们的基础还不是太雄厚；但是，我们相信主观能动性。我们想“挽狂澜于既倒”，我们决非徒托空言。世界人民、东方人民、中国人民的需要，是我们的动力。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是我们的愿望。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越来越变得聪明，是我们的追求。我们老、中、青三结

合,而对著作的要求则是高水平的。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个活动,既提高了中国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水平,又能培养出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收得一举两得之效。

我们既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我们反对民族歧视;但我们也并不张扬“东方中心主义”。如果说到或者想到,在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的话,那也是出于我们对历史发展的观察与预见,并不出于什么“主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对东方几十个国家一视同仁。国家不论大小,人口不论多寡,历史不论久暂,地位不论轻重,我们都平等对待,决不抬高与贬低,拜倒与歧视。每一个东方国家都在我们丛书中占有地位。但国家毕竟不同,资料毕竟多寡悬殊。我们也无法强求统一。有的国家占的篇幅多一点,有的少一点。这是实事求是,与歧视毫无关联。我们虔诚希望,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中,中国的两只眼睛都能睁开,而且睁得大大的,明亮而睿智。西方的一只眼睛能变成两只,也同样睁开,而且睁得大大的,明亮而且睿智。世界上各个民族也都有了两只眼睛,都要睁得大大的,明亮而且睿智。我们共同学习,努力互相了解。我们坚决相信,只要能做到这一步,人类会越来越能相互了解,世界和平越来越成为可能,人类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不管还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人类有朝一日总会共同进入太平盛世,共同进入大同之域。

1996年3月20日

序

泰国位于中南半岛中部,是我国的近邻。从明代开始,我国古籍称这个国家为暹罗。至20世纪30年代末期,暹罗才改称泰国(英文译名由Siam改为Thailand)。中泰两国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的历史。汉代到清代的中国古籍留下了大量的关于古代泰国和中泰交往的历史记录,这是我们今天研究泰国古代史、中泰关系史珍贵的历史资料。

早在汉代,湄南河流域和马来半岛北部已成为中印两大文明古国交通联系的桥梁。《汉书·地理志》记述的从徐闻、合浦出发到南印度黄支国的汉使行程,就途经湄南河流域和马来半岛北部一带。在汉代,我国古籍还记述在湄南河流域有一个古国称金邻(金陈)。三国时代,朱应、康泰出使扶南,留下珍贵的历史记载,加深了中国人民对金邻(金陈)国的认识。

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古籍出现了湄南河流域和马来半岛北部古国遣使“朝贡”的记载,这些古国有狼牙修(郎迦戌)、盘盘、投和(头和、堕和罗、堕罗钵底)、赤土(有学者认为赤土位于苏门答腊)、哥罗、哥罗舍分、参半等。

到了宋代,由于航海和造船技术的进步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古籍有关泰国境内的古国的记述更加具体,内容更丰富了。有学者认为,《诸蕃志》所记的古国中,真里富、登流眉、茸里、罗斛和浔番均在今天泰国境内。据史籍所记,登流眉是一个盛产沉香的国家,与宋朝有密切的贸易联系。真里富、罗斛多次遣使来“朝贡”,贸易关系也很密切,《宋史》《宋会要》等书有详细的记述。

到了元代,中泰交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现今泰国北部、中部、南部的古国都与我国有密切的交往,中国古籍有关这些古国的记述,有助于我们弄清泰国历史一些疑难问题。在北部,同中国有交往的古国有女王国(哈里本柴)和八百媳妇国(兰那王国)。在中部和南部,同中国

有交往的古国有暹国、速古台、速龙探、奔奚里和罗斛等国。速古台,就是素可泰的异译。速古台与暹国都遣使向元朝“朝贡”,说明泰国古代的暹国不是素可泰。

在明代,中泰的友好交往出现新的高潮。明朝和阿瑜陀耶王朝之间使者往来频繁,从1370年到1482年,明朝先后22次遣使出访暹罗;从1371年到1643年,阿瑜陀耶王朝先后共114次遣使来华(其中109次为暹罗国王遣使,5次为王子以及国王“女兄”遣使)。从《明实录》有关暹罗遣使“朝贡”的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阿瑜陀耶王朝权力斗争的蛛丝马迹。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其中有4次到过暹罗。为了便于沟通和往来,明朝在“四夷馆”里设立了暹罗馆。明朝继续保持与古国八百媳妇的友好交往,在“四夷馆”里也设立了八百馆。相互之间的密切交往,促进了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明朝官员还四次酝酿过与暹罗进行军事合作。

清代中泰交往也非常密切,清朝政府与泰国的阿瑜陀耶王朝、吞武里王朝、曼谷王朝都有密切的友好交往。16世纪,缅甸的东吁王朝发动多次对暹罗的战争,并在1564年、1569年两次攻陷暹罗京城阿瑜陀耶城。从1569至1584年,暹罗遭到缅甸长达15年的统治。暹罗摆脱缅甸人的统治后,为了取得外交上的支持和贸易方面的利益,阿瑜陀耶王朝希望与清朝建立密切的关系。从1664年到1766年的102年间,暹罗的阿瑜陀耶王朝共16次遣使来华“朝贡”。1749年,清高宗亲书“炎服屏藩”匾额赠送给暹罗国王。在朝贡贸易中,清朝政府给予暹罗优惠待遇。从1724年开始,暹罗米大量运入广东和福建。中泰之间的官方、民间贸易都有较大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民间贸易多为华人经营,行走于中泰两国港口之间的商船几乎全由华人管驾。

1767年,缅甸雍籍牙王朝的军队攻陷阿瑜陀耶城。暹罗的华人将军郑信带领暹罗人民开展复国斗争,创建了吞武里王朝。到1776年,缅甸全部被逐出暹罗领土。当时,中国官员对暹罗的情况还不甚了解,所以乾隆年间的对缅甸的战争中,有人提出过联暹攻缅的建议。郑信多次遣使来华,请求册封和开展贸易。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清朝政府没有册封郑信,但清朝与吞武里王朝之间的贸易关系还是很密切的。清朝政府多次满足吞武里王朝的要求,允许来华的暹罗商船采购特许的货物运回暹罗。

1782年,阿瑜陀耶城发生骚乱,郑信派将军披耶汕前往镇压。披耶汕到了阿瑜陀耶城后倒戈,带兵向吞武里发动进攻。吞武里兵力空虚,

披耶汕的军队攻入吞武里,郑信被迫退位,入寺为僧。得知吞武里事变的暹罗将军昭披耶却克里要他的侄子呵叻太守到吞武里控制局势,囚禁披耶汕。接着他从柬埔寨前线赶回吞武里,下令杀死郑信,自立为王,创建了曼谷王朝。为了取得清朝政府的承认,昭披耶却克里(拉玛一世)自报是郑信的儿子,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汉化的名字郑华,宣称要遵循“三年一贡”的旧例,遣使到清廷“朝贡”。1787年,清朝正式册封郑华为暹罗国王。

曼谷王朝与清朝之间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从1782年到1852年的70年间,暹罗共35次遣使来华。拉玛二世(郑佛)、拉玛三世(郑福)和拉玛四世(郑明)受到清朝政府的册封。1828年,清朝军队平定了南疆暴乱,俘获首恶张格尔,粉碎英国殖民者侵略我西北边疆的阴谋。1829年,曼谷王朝遣使向清朝政府表示祝贺。在曼谷王朝和清朝的共同努力下,中泰之间的贸易仍有较大的发展,在泰的华侨为此作出贡献。虽然在1852年以后朝贡活动停止了,中泰之间近代的外交关系也未能随之建立起来,但两国官员仍有接触,有中国官员到暹罗,也有暹罗官员到中国来。在中法战争期间,还有中国官员提出过联合暹罗进攻在西贡的法军的设想。这个时期访暹的中国官员的著作,加深了中国人民对暹罗的认识。19世纪90年代,英法在暹罗进行激烈争夺,中国官员和报刊关注法国殖民者在暹罗的侵略活动,关注在民族危机情况下拉玛五世在暹罗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本书是集汉代到清代的142种古籍中有关泰国的资料汇编而成,并对涉及的部分人名和古地名作简单注释。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对研究泰国史和中泰关系史会有帮助。对一些古地名,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而且研究工作还在不断深入。由于编注者学术水平的限制,书中的注释会有错误,敬希专家和读者指正。

除《中国古籍中有关泰国资料汇编》之外,我们还编了《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等一系列的书。其中《中国古籍中有关泰国资料汇编》引用的文献,凡原著中有参考价值的脚注,均用括号()录入正文。错别字则予以更正,用括号()注在错别字之后;遗漏的个别字予以补正,用括号[]注在遗漏之处,均不另作注释。本书所辑文献,凡录自正史的,均采用中华书局点校本。其他文献有点校本者,均以新点校本为据。其中个别地方我们认为标点不当者,则予以改动。我们还编了“地名索引”“引用书目”附在书后,供读者查阅。

本书由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主编,由黄重言、余定邦负责收集和编注。本书完稿后,为使本书能及早出版,钱江博士曾提供协助,对此我们表示感谢。本书能出版面世,我们要感谢梁志明教授的推荐,感谢“东方文化集成”编委会张殿英教授、梁立基教授的大力支持。“东方文化集成”编辑部的樊津芳老师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为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具体细致的工作,在此谨致谢意。

作者

2014年12月